

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周 岩^①

(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徐州 221009)

摘要: 传播学交叉研究促进本学科不断创新,同时繁荣丰富了其他学科,促进各学科的协调发展,成为连接其他诸多学科的纽带。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起步阶段(1978—1989)、全面推进阶段(1990—1999)和继续拓展阶段(2000—至今)。研究呈现出跨学科性、综合创造性、主体协作性、相对独立性的科研特征,并以移植型研究、中心理论型研究、聚焦型研究的基本形式开展。在研究内容上,与传播学进行交叉的学科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范围之内,研究始终密切联系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正不断追赶国际前沿研究并期待有所突破。在当前存在的不足有:传播学交叉领域和主题丰富多样,但缺乏多样性的统一;一些交叉研究浅尝辄止,对国外成果有一定的依赖性;跨学科合作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困难。

关键词: 传播学, 媒介理论, 交叉研究, 新兴学科, 中国大陆

在当今时代,科学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这使得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层出不穷、迅速成长。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开拓了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新领域,提供了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新原理和新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飞跃,具有划时代意义。传播学是在诸多学科领域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在与社会传播相联系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综合学科。传播学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传播系统的认识,同时还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地带不断出新,促使其他很多科学学者跳出自己原有学科的有限天地,冲破传统学科方法的束缚,面对新的条件和新的科学事实,进行新的思维方式,以求发展当代学术研究的新原理、新理论、新方法和新领域。

一、传播学交叉研究的缘起、意义与原则

交叉学科,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不同学科领域、部门和分支学科交叉渗透、彼此结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型学科。最早公开使用“交叉学科”术语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 K. S.伍德沃思。1926年,他指出:社会科学理事会是几个学科的集合,要努力促进不止一个学科进行的研究。193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一份有关理事会目标的声明中,正式使用“交叉学科的活动”的说法。1937年,“交叉学科”术语首次被收入《新韦氏大学词典》和《牛津英语辞典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交

^①[作者简介]周岩,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讲师,传播学硕士,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研究。

叉学科”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术语。^①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以研究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与传播活动的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兴的知识领域，它诞生在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学科和社会传播相交叉的边缘地带，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随着传播学理论的不断整合，其研究视角、概念、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发展，为不同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的选择。因此，传播学跨学科的交叉特征从诞生伊始就十分明显。按照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说法，传播学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传播学实际上存在于很多学科对于人类社会各种传播现象的研究之中，其学科交叉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

传播学的交叉研究，是传播学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其它学科和其他领域彼此渗透、彼此结合、相互作用而形成新兴学科或研究领域。真正的交叉研究不是几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所以，传播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点都应是多元的。传播学交叉研究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体学术界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意义。

1、传播学交叉研究促进本学科不断创新。交叉学科研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不同的学科或不同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融合的结果。交叉学科生长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缘地带，是科学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往往能取得丰硕的创新成果。传播研究是一种交叉性质的研究，交叉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形成某一门新学科。从学科起源来看，传播学诞生于很多其他学科的交汇处，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维尔是政治学家，卢因是社会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是社会学家，霍夫兰是实验心理学家，他们在进行自己本学科研究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进入到了传播的领域，于是在交叉地带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基石，这些研究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可以说，传播学研究至今为止还需要继续跑马圈地，继续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被誉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英语文学博士，他认为：传播研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科，更像是多种学科的交叉路口。^②由于自身的学科特性，传播学较之其他学科更需要进行交叉研究，只有不断地进行跨学科探索，才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角度，从而发展自我，完善自身理论建构，推动传播学不断发展。

2、传播学交叉研究繁荣丰富其他学科，促进各学科的协调发展。交叉研究方法，特别

^①参见金哲：《论当代交叉学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年第3期。

^②葛岩：《问题：跨学科对话、合作的可能途径》，《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是一些高层次方法的产生和应用,帮助人们撇开各种事物现象过程的具体性,成为科学抽象性的方法学科,具有普遍意义,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套新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可以扩大各学科科学人的原有视野,改变原有思维方式,推进理论创新。^①同时,传播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各学科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和创新。传播学理论中,议程设置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的课题,“沉默的螺旋”也是一个舆论学、心理学的课题,培养理论也是社会学问题,“知沟”理论也是社会学、国际政治学问题,而创新与普及等研究则包含了更多的学科领域。可以说,传播学交叉研究在探索自我的同时,也推动着其他相关的学科的创新,这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3、传播学交叉研究成为连接其他诸多学科的纽带。当代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在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学科之间的边缘地带出现了新的增长点,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是新学科诞生的地方。作为一门新型学科,传播学是生长在多门学科会和交叉地带的一棵“大树”,^②汇聚了诸多学科理论,就是为了促进当代学科间的联袂发展。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传播学交叉研究,恰恰起到了联系诸多学科、融合各种理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作用,促成诸多学科新的发展。

传播学交叉研究应该有这样一些原则规定:(1)传播学交叉研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条件的,最大的条件就是我国社会迅速转型而产生的巨大社会变化。交叉研究是传播学和其他学科内在动力的作用下,各学科矛盾自身演变的结果。(2)当代学科的发展,从学科整体格局上看,需要冲破原有的学科系统。而传播学作为仍属于学科成长期的一门多学科、多重交叉而形成的新型学科,则需要其他学科与之交叉渗透、创造性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3)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内容不应是对某门其他学科知识的简单抄袭翻版,而是在传播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空白地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成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理论原理、方法原则、范畴规范等学科基本要素。

二、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传播学研究的开端,也是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起点。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阶段一:1978——1989年,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起步阶段

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西方现代传播概念被介绍到我国以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

^①参见金哲:《论当代交叉学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季刊》,1994年第3期。

^②参见邵培仁:《传播学》(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页。

经历了引进、开垦、培植、播种、收获与发展的不同阶段。1978年后，日本和美国的一些知名传播学者相继访问我国大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学者施拉姆等所著的《传播学概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等中译本出版为标志，传播学开始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传播学研究的论著：1978年7月，郑北涓编译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在新闻传播界引起反响；第一本书介绍西方传播学的论文集《传播学（简介）》于1983年问世。此时的传播学交叉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涉及内容和领域均较少，但是也已经开始受到关注。比如何道宽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对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研究；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从传播学和文化学交叉的角度剖析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创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视角。

2、阶段二：1990——1999年，传播学交叉研究全面推进阶段

在经过了一个低潮期之后，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传播学界认真反思，研究重点开始逐步转移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相联系的传播学研究中。这个时期，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探索发展特点是为我所用，借鉴西方传播学中一些符合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需要的观念、资讯观念、新闻反馈观念和受众观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于是，强调中国特色、提倡本土化的研究开始深入发展。本着注重现实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开始丰富。

1990年6月，我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当代传播学丛书》出炉，丛书包括：《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主编邵培仁“将传播学的原理、知识运用于政治、经济、教育、艺术、新闻等领域，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崭新的理论构架、最新的信息资料、缜密的理论阐述”^①形成这套丛书。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陆的第一套传播学研究丛书就是从交叉研究开始的，它既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正式铺开的标志。在那样一个“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②的时期，此套丛书实在是难得的硕果。

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题的图像世界之迷》是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认为：“文化与传播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文化离不开传播，而传播本身就蕴含了文化的传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此著作具有鲜明的交叉

^①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6页。

^②王怡红：《传播学研究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研究特色,可说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一本力作。这个阶段以文化与传播为主题的著作还有:王志章编著的《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1991);戴元光主编《文化的撞击:西北文化传播研究》(1992);余也鲁、郑学檬主编的《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1995)等。

网络与传播研究在 90 年代已经值得关注,出现了一批著作。此外,在传播学与社会学、新闻学、医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艺术学、舆论学、宣传学、法学等很多交叉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这个时期共出现了传播学交叉研究领域 21 个,著作 80 部。可以说,这是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全面推进阶段。

3、阶段三:2000——至今,传播学交叉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学跨学科交叉研究进入到快速推进阶段,在研究领域分化的基础上出现融合和再分化,同时也更加集中地体现在几大交叉领域之中。交叉研究使得传播学的显学地位日益突出。

中国加入 WTO 后,对外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何道宽在 1983 年就在四川外语学院组建了“比较文化研究室”,关世杰的《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姜飞的《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林晓光的《中国由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移动的假说》等文章对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影响很大。

互联网的推广与普及是新千年的重要时代特征。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影响带来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网络传播社会影响力、网络传播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网络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体系、网络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网络传播伦理与法制等等。伴随着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传播的研究主题更加丰富,交叉领域更加广阔。

传媒经济学更是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自从邵培仁教授在 1998 年出版了《媒介经营管理学》之后,大量的此类著作不断出炉,相关论文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文章中所占的比重增大,研究范围日渐广泛,研究热点日渐增多,研究方法日渐丰富。近年有统计显示,传媒经济方面的论文已达到 1000 余篇,专著超过 200 部。^①当前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对媒介经济基础理论的认识与媒介经营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困扰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焦点。

面对全球化与网络社会崛起、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加速转型,我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为传

^① 参见李思屈等:《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30 年 12 大热点》,《中国传媒报告》,2008 年第 1 期。

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需要传播进行更多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在新千年以来，传播研究主题进一步拓展，其中大部分是交叉研究，如：体育传播、健康传播，媒介与社会性别，媒介素养、媒介生态、媒介地理、媒介与农村发展、媒介伦理与法制、媒介经营与管理等等。同时，在传播学派及其思想研究方面，出现了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媒介霸权理论、符号理论的引入，以期待在传播学基础理论上有所建树。

30 余年来，传播学交叉研究主要跨越了新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舆论学、公共关系学、医学、经济学、心理学、广告学、艺术学、教育学、宣传学信息学、管理学、知识学、伦理学、法学、语言学、营销学、网络研究、美学、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学科领域，出现的具体的研究方向更是不可枚举。一些新的交叉边缘性研究依然不断涌现。明安香认为，这种交叉融合的趋势必然会将传播学引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传播学交叉研究核心作者群也在形成。邵培仁在政治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新闻传播、经济传播、传播社会、媒介经济与管理、媒介生态、媒介地理等很多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贡献卓越。邵培仁还指导博士生对媒介人种论、媒介身份论、媒介认同论、媒介演化论、媒介歧视论、媒介愿景论、媒介排斥论、媒介公平论等二十几种媒介前沿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1 世纪媒介理论丛书”。戴元光、张国良、袁军、胡泳、胡钰、郭镇之、朱增朴等人在多个传播研究领域亦有很大建树。此外，童兵、胡正荣、李彬、张咏华、周鸿铎、雷跃捷、刘建明、崔保国、杜骏飞等学者的传播交叉研究也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传播学交叉研究的特征与形式

1、科研特征

(1) **跨学科性**。跨学科性是交叉研究最明显的特点。交叉学科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由于许多单一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横跨多门单一学科来研究的问题。跨学科研究反映了诸多学科在当前的发展越来越紧密，不断纵向深入、横向渗透。传播学交叉研究，是将传播学研究向诸多其他学科延伸，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质。

(2) **综合创造性**。创造性是科学的生命，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创造性。单一学科的创造性主要是替代性的，即以提出新概念替代旧概念，创立新理论代替旧理论，发明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等。而交叉研究则表现为独特的综合创造性，尤其是在不同理论、不同技术的交叉研究中，各单一学科由于各自独立的发展，结果不断重复地发现相同的规律，如能从同一

^① 参见李思屈等：《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30 年 12 大热点》，《中国传媒报告》，2008 年第 1 期。

层次上的学科问题相互交叉和渗透，并在高层次上协调和综合，就会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理论。^①在传播学研究中，鲜有替代性研究成果，多以补充和发展以往研究成果的形式出现。而在交叉研究方面，传播学的综合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媒介需要盈利和进行内部管理，于是媒介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知识汇成了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再比如关于国际新闻传播中的话语倾向研究，则需要分析国家意识形态、新闻制作过程、文本内容、媒介呈现形态等方面，其中包含了传播学、新闻学、国际政治学、叙事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而研究中始终以文本信息分析贯穿，可见传播学在此类研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3) 主体协作性。维纳认为：在科学的交叉地带进行查勘和开垦工作“只能由这样的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但每人对他临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大家都习于共同工作，互相熟悉对方的思想习惯，并能在同事们还没有以完整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新想法时，就理解这种想法的含义。”^②一般来讲，传播学交叉研究学者很难具有研究所需要的多门学科知识，即使有，大部也只是一般性了解，难以深入。因此，随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后的交叉研究应该走与其他诸学科的学人共同合作的道路。曾经进行过合作研究的葛岩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合作，很难完成跨度大的研究，而我们现存的体制在协作研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4) 相对独立性。交叉研究一旦形成，并不是消极地依赖于原有的母体学科，而是有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进程和体系结构，即相对独立性。在传播学交叉研究中，虽然是通过不同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和技术相互融合、相互借助而形成的，但并不是简单套用和机械叠加，而是经过创造和加工，使得彼此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全新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比如媒介生态学是媒介学和生态学进行学科交叉的产物，其中运用了现代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并将之融入到媒介研究中。但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理念、方法和思路，邵培仁教授规定了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整体优化、互动共进、差异多样、平衡和谐、良性循环、适度调控”六大原则以及研究的核心范畴，并且进行媒介生态城堡的构想与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已经脱离母体的新学科的独立性。

2、基本形式

(1) 移植型研究。这里的移植型研究，就是把传播学的科学概念、理论、方法等推广应用，转移嫁接到另一学科领域，使之转化后的概念、理论、方法成为传播学交叉研究的新

^① 参见吴洁：《对交叉学科及其科研管理的思考》，《研究与发展管理》，1997年第4期。

^② [美]N·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1963年，第3页。

^③ 葛岩：《问题：跨学科对话、合作的可能途径》，《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理论体系。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移植。在社会科学部类内部，把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思路与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文化学、民俗学、知识学、新闻学、舆论学等学科，分别产生了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社会传播学、教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军事传播学、文化传播学、民俗传播学、知识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舆论传播学等新学科。而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之中，则形成了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传播法学、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传播伦理学、传播美学、传播语言学、媒介人种学等研究。从哲学的视野去审视传播则形成了传播哲学研究。统计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将其嫁接到传播学研究中，则出现了传播统计学。传播学与自然科学移植嫁接，比如医学，便出现了医学传播学、健康传播研究，将地理学、生态学的视角去分析传媒，则形成了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研究。传播学跨学科部类进行交叉研究，不仅涉及基础科学，而且发展了许多应用科学，显示了传播学研究的广泛适应性。

(2) 中心理论型研究。此类研究是指：在传播学交叉研究中，以其他某一学科理论为稳定的理论生长点，并以此为中心理论，进行发散思维，构筑新的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传播学作为整体和其他学科的某一理论进行交叉。这又分成两种形式。第一种，其他学科理论直接作为中心理论与传播学进行交叉。比如：偏见本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根据一定表象或虚假的信息相互做出判断，从而出现判断失误或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现象。将偏见研究成果作为中心理论，运用到分析当前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偏见问题，进行发散思维，从而构筑了媒介偏见论的理论体系。类似的研究还有媒介歧视论、媒介愿景论、媒介认同论、媒介崇拜论、媒介记忆论、媒介失忆论、媒介恐慌论、媒介恐怖论等等。第二种是将其他学科的某些理论进行改造使用后作为中心理论与传播学进行交叉。比如：人种学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1964年，德尔·海默思将其引入到传播学。1986年，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将传播人种学研究引向大众传播领域。此后，“Ethnographic of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方法论开始受到传播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该研究方法逐渐升温，有人称之为“人种学研究的转向”，或者“新受众研究”。马尔库斯和费彻特认为，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从人种学角度对媒介、社会重组、科技这三个广泛结构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探讨，将会很有意义。^①再比如：相对于整个地球而言，空间是个地理学概念。而当空间相对于传播媒介的时候，便使原来的空间意义有了变化，形成了关于媒介空间论的探讨。类似的例子还有，将作为历史概

^① 参见邵培仁：《媒介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85页。

念的时间放置于信息时代的媒介化社会里探讨，一个新的媒介研究角度：媒介时间论，即一种针对媒介的时间观念的研究产生了。

(3) 聚焦型研究。聚焦型研究是指多种学科及其研究力量集中投射到某一领域的研究形式。^①在大科学时代，许多研究课题不是个别研究者或者某门学科单独进行研究就能够奏效的。主题研究是我国传播学研究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特征。比如政府形象传播与危机管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需要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和传播学多个学科共同投入，进行多重交叉与融合。这样的研究课题需要动用的知识领域太多，只有将从事各门学科的研究者组织起来共同协作，才有可能在这样的聚焦研究地带取得创新和突破。当前此类研究还有关于媒介政策与法制研究、新闻传播公信力研究、收视率研究、传媒与农村发展建设、国际传播等等。

四、传播学交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1、内容特点

(1) 与传播学进行交叉的学科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范围之内。除了健康传播等个别研究兼有文理特征之外，大部分传播学交叉研究都是在社会科学范围之内的。可见，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具体情况和传播学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决定着当前传播学交叉研究的社会科学性质。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三论”对传播学的建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传播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会不断增加。

(2) 传播学交叉研究始终密切联系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传播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在于密切关注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从学科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传播学研究需要不断地与其他很多学科进行交叉，这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规律。比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媒产业不断兴起，经济管理视点下的传播学研究受到关注，大众传播与经济发展、媒介管理、公共关系、广告经营研究、媒介融合研究等研究迅速上升。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媒介生态研究恰恰暗合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对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致力，体现了我国传播学研究关注社会、解决问题的重要现实意义，研究主题的丰富又体现着传播学研究社会价值的广泛性。

(3) 传播学交叉研究正不断追赶国际前沿研究并期待有所突破。大部分当前国际前沿研究都是传播学交叉的研究。在服务社会和逐步构筑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自己的”传播学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前沿研究，使我国传播学研究逐步与世界接轨。浙江大

^① 曹勇、吴永波、陈国清：《对交叉学科及其科研管理的理论思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 年第 4 期。

学邵培仁教授近年来所进行的以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研究为核心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媒介理论前沿》一书中。此书以媒介理论为聚焦，以学术前沿为指标，通过宏大构架、多维视野和立体思维，对 19 种媒介理论和研究进行了分析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精辟的简介和观点，体现出我国学者对世界传播学前沿的关注与参与。

2、不足之处

(1) **传播学交叉领域和主题丰富多样，但缺乏多样性的统一。**传播学交叉研究的领域已经很多，成果已具规模，“但由于缺少多样性的统一，研究过程与理论资源的探索被简略化或单一化，致使多样性不过是研究者站在原地的东张西望”。^①对此，邵培仁教授的研究思路值得推广。邵教授以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地理学相交融为理论核心视角，与其他诸多学科理论、概念进行交叉研究，形成了媒介愿景论、媒介认同论、媒介融合论、媒介仪式论、媒介人种论、媒介时间论、媒介空间论、媒介游戏论、媒介执政论、媒介崇拜论、媒介身份论、媒介歧视论、媒介弱智论、媒介失控论、媒介失声论、媒介失忆论、媒介恐慌论等。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和以往研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多样的主题有了统一的核心研究视角，即媒介生态和媒介地理观念。

(2) **一些交叉研究浅尝辄止，对国外成果有一定的依赖性。**一些专著以交叉研究为名，将一些其它学科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生搬硬套到传播学研究中去，肤浅、机械地拼凑到一起，而内容却平淡无奇，造成了“食而不化”。同时，交叉研究专著中存在主题雷同和低水平重复现象，抄录和堆砌国外现成的理论和数据较多，显得缺乏自我思考。还有一些著作，生搬硬套一些西方传播理论和研究模式，没有运用中国人擅长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没有将自己研究植根于在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当代学术的土壤之中，没有紧密联系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令读者不得要领。因此，加强研究的原创性，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实状况，在交叉地带不断地进行学科知识的融合性创新，应当是深入研究的重要努力方向。

(3) **跨学科合作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困难。**从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界整体的引证行为来看，主要是本学科领域的中外著述，而对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则基本漠视。交叉领域的研究者竟然不关注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确实出现在传播学交叉研究之中。大学的系科网络仍然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架构，资源的分配、教师的聘任和晋升、项目的评审等等都是围绕系科来运作的。这种制度安排无疑增加了各学科间交叉研究的成本，也阻碍了交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跨学科合作既存在着途径、兴趣等问题，也存在学

^①王怡红：《传播学研究 30 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年第 5 期。

科体制上的限制等问题。^①至今为止的大部分交叉学科研究都出自传播学研究者圈内，呈现出保守的特征。

五、展望与结语

传播学交叉研究进一步取得突破，需要进一步走出自我的圈子，到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加强多学科合作，欢迎多学科学人到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国外成功经验的借鉴也很重要。比如设立激励性资助项目，大学以“种子基金”的形式资助具有发展前景的交叉研究项目，而在我国已经有部分研究型大学通过设立各类学科交叉预研基金项目，大力扶持和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再如改革教师聘任机制。威斯康星大学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推出集群聘任制取代了常用的双聘制。集群指投身跨学科研究的教师群，受聘人员在行政上归属某个系，但全部由学校专款聘任。目前，这所大学共有 49 个不同领域整合出来的集群，共聘任了 140 位左右的研究人员。集群已成为支持优先发展领域、吸引优秀科研人才、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手段。还可以改革项目评审机制。方法之一是在学科评审委员会内部倡导跨学科研究，增强他们对跨学科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以确保跨学科研究项目得到平等对待。方法之二是设立专门的跨学科项目评审委员会，从而避免与学科研究项目竞争同一项基金。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建议在项目评审书中设置是否为跨学科研究项目的选项，如果是跨学科研究项目，申请者必须明确陈述涉及了哪些学科，以及为什么要包含这些学科，这样有助于在评审时选择合适的专家。它还建议评审委员会中应包含跨学科合作方面的专家，以确保研究项目的跨学科合作质量。这样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通过一定的吸收和改造，应用到我们国家的科研管理中来。^②

纵观 30 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个别时期历经波折，但是学科的整体发展形势始终旺盛。陈韵昭教授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文的序言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开设传播学的大学日见增多，还有传播学专业、传播学研究所亦相继建立。”许多读者拿着书单四处寻购传播学书籍。“就连个别怀疑过这门学科，或更提出过责问的同志，现今亦已不满足于仅仅知晓一点传播学 ABC，而发奋地钻研起传播学的 XYZ 来了。”^③随着研究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学者素质的普遍提升并趋向年轻化，传播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而大批的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各部门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必然使得传播学的交叉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走向深入。传播学交叉

^①参见葛岩：《问题：跨学科对话、合作的可能途径》，《新闻大学》，2008 年第 2 期。

^② 参见黄华新、王华平：《论跨学科研究》，《光明日报》，2010 年 3 月 16 日，第 11 版。

^③转引自邵培仁：《论中国当代传播学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

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不仅丰富和发展传播学自身,同时也使传播学深深地渗透到广阔的其它学科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传播学的研究会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①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
<http://ccs.nccu.edu.tw/chtml/ccsnews/chinawork.htm>, 2002/01/15-2002/08/09
[《The Important Items of China Mainland's Communication Science's Monograph and Translation》]
2.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Shao Penren:《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邵培仁:《媒介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Shao Penren:《Advanced Research of Media Theor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李光,任定成:《交叉学科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Li Guang, Ren Dingcheng:《Introduction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ubei People's Press, 1989.]
5. [美]N·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1963年。[Norbert Wiener:《Cybernetics》, Hao Jiren, Science Press, 1963.]
6. 邵培仁:《论中国当代传播学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Shao Penren:《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1996. 2]
7. 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Chen Lidan:《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hina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Modern Communication》, 1995. 4.]
8. 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Zhang Jiankang:《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 Mainland's Communic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3. 2.]

^①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9. 李思屈等:《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30 年 12 大热点》,《中国传媒报告》,2008 年第 1 期。[Li Siqu:《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12 Hot Theoretical Issues Discussed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or 30 Years in China》,《China Media Report》,2008.1]
10. 王怡红:《传播学研究 30 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年第 5 期。[Wang Yihong:《Review of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China》,《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9.5.]
11. 吴洁:《对交叉学科及其科研管理的思考》,《研究与发展管理》,1997 年第 4 期。[Wu Jie:《A thought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its management》,《R & D Management》,1997.4.]
12. 曹勇、吴永波、陈国清:《对交叉学科及其科研管理的理论思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 年第 4 期。[Cao Yong, Wu Yongbo, Chen Guoqing:《A theoretical thought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its management》,《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1995.4.]
13. 葛岩:《问题:跨学科对话、合作的可能途径》,《新闻大学》,2008 年第 2 期。[Ge Yan:《Question:the possible ways to dialog and cooperate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Journalistic University》,2008.2.]

The Review and Overview on the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Zhou Y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9,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ot only promote the discipline innovation, but also prosper and enrich many other subjects. In addition, the studies become the link that connects many other subjects to harmonize the advancement of various subjects. Th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including the initial stage (1978—1989), comprehensively propulsion stage (1990—1999) and Continued expansion stage (2000—present). The features of the research are: interdisciplinarity, integrated creativity, agent cooperation and relative independence. At the same time, its basic forms include transplanted research, centered theory research and focused research. In content, the subjects which intersect with Communication mainly focus on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s, the researches always

closely relate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s constantly chasing the international forefront researche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a breakthrough.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re: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and subjects are various, but lack in unity; Some are content with the commonplace, dependent on overseas results;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dia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merging discipline, Mainland China

——载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10 年第 2 期